

考古文本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策略探讨

——以《发现三星堆》英译为例

聂丽彬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3日

摘要

本文以刘宓庆的文化翻译理论为框架, 以《发现三星堆》一书的汉译英翻译实践为案例, 探讨考古文本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策略。研究采用文本细读、译例对比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法, 依据刘宓庆对文化信息的层级划分, 将书中主要的文化专有项分为实物文化词(物质形态层)与观念文化词(心智活动层)两类并分别展开分析。研究表明: 对实物文化词, 宜采取“音译 + 定性词 + 注释”的复合补偿模式, 通过文本内证、外证与人文互证等证据链, 确保译文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而对观念文化词, 翻译的关键在于对文化概念的深度把握, 需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心理与观念系统, 并在异化与归化之间实现动态平衡。通过对《发现三星堆》英译案例的分析, 本文验证并拓展了刘宓庆的文化信息层级分类在考古文本翻译中的适用性, 将抽象的理论框架转化为可操作的文化专有项识别与处理策略, 为文化翻译理论提供了来自考古文本领域的实证支撑, 期望为同类文本的翻译实践与方法论建设提供有益参照。

关键词

考古翻译, 文化专有项, 三星堆, 文化翻译理论

Exploration of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ng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Archaeological Texts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to-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Sanxingdui Culture

Libin Ni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ch 16, 2026; accepted: April 13, 2026; published: April 23, 2026

文章引用: 聂丽彬. 考古文本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策略探讨[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4): 551-557.
DOI: 10.12677/ml.2026.144327

Abstract

Taking Liu Miqing's theory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as a framework, and using the Chinese-to-English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Sanxingdui Cultur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discusses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ng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archaeological texts. The study employs a combined approach of close reading, translation-by-example comparison,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Following Liu Miqing's hierarchical categorizatio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the book's main culture-specific items a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material-culture terms (the material-form level) and ideational-culture terms (the mental-activity level)—and analyzed separatel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for material-culture terms, a composite compensatory model of phonetic transliteration plus qualifying terms and annotations is appropriate, supported by a chain of evidence from internal textual corroboration, external corroboration, and humanities-based cross-checks to ensure accuracy and scientific rigor. For ideational-culture terms, the key lies in a deep grasp of the cultural concepts, requiring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ying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conceptual system, and achieving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alienation and domestic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to-English translation case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Sanxingdui Culture*, this paper validates and extends Liu's hierarchical categorizatio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for archaeological-text translation, translating the abstract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to operable strategies for identifying and handling culture-specific items. It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the field of archaeological texts and aims to offer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of similar texts.

Keywords

Archaeological Translation, Culture-Specific Items, Sanxingdui,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三星堆遗址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不仅为探索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实物证据，也深化了学界对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以这些成果为基础撰著的《发现三星堆》一书，系统阐述了三星堆政体、文明演进历程及其与中原地区、周边乃至欧亚古代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兼具学术深度与大众普及价值，具有重要的对外译介意义，亦可视为推动中国考古知识国际传播的典型案列。

本研究通过对《发现三星堆》英译过程中的典型案例进行梳理与分析，聚焦由实物文化词与观念文化词构成的文化专有项，考察其在翻译过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处理方式，进而尝试归纳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翻译策略与原则。研究旨在丰富考古类文本翻译的实证语料，并为今后同类文本的外译实践提供借鉴，以助力提升中国考古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质量与影响力。

1.2. 文献综述

考古文本翻译作为一项跨学科研究领域，国内外学界已从不同维度展开探讨，但专门针对中国考古文本特殊性及其翻译方法的系统研究仍较为薄弱。

在国际学界,相关研究多集中于西方文化遗产,主要关注博物馆语境下的文物名称翻译[1]、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文件翻译中的理解偏误、文化因素与译者角色[2][3]、考古物质遗存的文化翻译模式(包含符号学解读、语境协商和历时性转换)[4]等方面。这些研究为考古翻译实践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参照,但大多未触及中国考古文本因语言文化特异性而产生的独特翻译困境。

相较之下,国内学界直面中国考古文本翻译的实践挑战,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问题诊断层面,普遍指出当前翻译中存在的术语不对等现象、历史文化内涵深厚导致的理解与表达困难[5],以及因忽视目标受众而产生的“内宣式外宣”传播倾向与文化背景信息缺省等问题[6];二是原则探讨层面,学者们提出若干具有指导性的翻译主张,如文物译名应兼顾民族性、信息性与回译性[7],考古报告翻译需追求语义、文体与读者反应的多维对等[8],专业术语翻译应具备概括性与透明性[9]等。这些研究揭示了考古翻译在语内理解、文化适应与读者接受等多个层面面临的挑战,但整体仍以现象描述与宏观原则探讨为主,尚未形成层次分明、可操作性强的翻译方法论体系。

综观上述成果,国内外学界在考古文本翻译领域虽已积累一定基础,但仍存在若干值得关注的局限。一方面,国际研究多聚焦于西方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局部问题(如文物定名、博物馆标签等),尚未系统回应中国考古文本因语言文化特异性而引发的翻译困境;另一方面,国内学者虽已敏锐识别出术语不统一、文化负载词处理困难、受众意识缺失等核心问题,并提出相应翻译原则,但整体仍以经验总结与宏观倡导为主,尚未建立起层次分明、可供操作的方法论框架。此外,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某一类翻译难题(如文物名称、考古报告等),较少将考古文本视为一个由多重文化信息层级构成的有机整体,从文化专有项的分类视角展开系统性考察。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刘宓庆的文化翻译理论为分析框架,以《发现三星堆》英译实践为案例,从文化信息的层级性出发,将考古文本中的典型文化专有项划分为实物文化词与观念文化词两类,并逐一考察其在翻译转换中的识别依据与处理策略。在案例选取方面,本文遵循以下标准:(1)翻译决策过程存在明显困难或多种备选方案的文化专有项,具体涵盖文化概念在目的语中无直接对应词、原文语义需借助考据加以辨明、文化内涵复杂需通过内外证互参方可确定等情形;(2)能够反映考古文本翻译共性难题的文化专有项,如文化背景知识缺失、学术表述与大众理解难以兼顾等问题;(3)覆盖本文所探讨的文化专有项的主要类型,即实物文化词(如文物名称、纹饰部件)与观念文化词(如宗教观念、民族观念),以呈现两种类型词汇在翻译策略上的差异与共性。

通过文本细读、译例对比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法,本文旨在提炼适用于考古文本中文化专有项英译的方法论原则,以期填补现有研究在分类考察与策略提炼方面的不足,为同类文本的翻译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参照,进而助力中国考古学术对外传播从“译出去”走向“融进去”的双向对话。

2. 文化专有项的概念与分类

“文化专有项(culture-specific items)”这一概念由西班牙翻译学者艾克西拉(Javier Franco Aixelá)提出,指在目标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概念,或处于不同文本地位,因而在翻译转换过程中引发功能与含义对应困难的文本项目。其中,“不同文本地位”主要指因意识形态、用语习惯或文化惯例差异而导致的文本价值变异[10]。

就《发现三星堆》这一案例文本而言,刘宓庆关于文化信息的层级分类为文化专有项的界定与分析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他在《文化翻译论纲》中指出,有效文化翻译的首要前提在于充分把握原语中的文化信息,并将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划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物质形态层,即以物质、器物等实物形

式呈现的文化；二是典章制度层，即为维系社会秩序而设立的规约、体制与机构；三是行为习俗层，即历时形成的社会约定行为模式；四是心理活动层，即观念系统、认知活动及精神创造(如文艺、学术等)[11]。

作为一部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考古著作，《发现三星堆》涉及大量文物遗存、古代制度、礼俗传统及文献记载，其内容与上述四个文化层级高度吻合，为分类考察其中的文化专有项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坐标。此外，刘宓庆提出的语义诠释四种路径，即文化历史观照、文本内证与外证、互文观照及人文互证[11]，也为笔者在《发现三星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阐释与策略选择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文将对《发现三星堆》英译中的典型译例展开分析，探讨文化专有项在翻译实践中的识别依据与处理策略。

3. 《发现三星堆》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策略分析

依据刘宓庆对文化信息的层级划分——物质形态层、典章制度层、行为习俗层与心智活动层，《发现三星堆》中的文化专有项可归为三类展开分析：实物文化词(对应物质形态层)、观念文化词(对应心智活动层)，以及社会文化词(涵盖典章制度层与行为习俗层)。本文主要聚焦于前两类词汇的翻译策略，以考察考古文本中典型文化专有项的跨语言转换机制。

3.1. 实物文化词(物质形态层)

实物文化词指“人类以物质形式(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一切数以千万计的与人的衣食住行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materialized culture)实体”[11]。在《发现三星堆》中，此类词汇主要包括文物名称(如玉琮、玉璋、陶盂、高柄豆)、文物上的纹饰或部件(如夔、龙、直内)，以及其他文化内涵丰富的实物(如“齿贝”)等。

对于此类文化词的翻译，本文根据目标读者群体的差异，将补偿性注释区分为“学术性注释”与“普及性注释”两种类型，前者侧重考据严谨性与专业深度，后者则注重表达简洁性与理解便捷性。

针对文物名称的翻译，本书主要采用“定性词 + 音译 + 文后学术性注释”的组合策略(定性词与音译的顺序可灵活调整)。此类注释面向专业读者或对考古学有较高认知需求的受众，内容上强调形制特征、礼制功能及学术定论的准确呈现。例如，“玉琮”译为 *jade cong*，并辅以脚注说明其形制与功能：*Cong (琮) is a tubular ritual artifact typically characterized by a square outer cross-section encircling a circular inner void, pierced by a cylindrical central hole.* 此类注释的撰写注重借助文本外证，参考专业学术文献以确保准确性。如“琮”的注释即参考了张法对玉琮形制的描述：“琮在良渚时代进入礼器系列之中……琮最后定型在内圆外方上”[12]。“红山玉龙”中“龙”的翻译则更具策略性：鉴于中国文化中的“龙”与西方 *dragon* 在形象与象征意义上存在显著差异，为避免混淆并体现其文化特殊性，译文采用音译形式“*loong*”，并附文后学术性注释，补充说明东西方文化语境差异：*Loong, a mythic figure being frequently equated with Western “dragons,” is China’s divine ancestral protector and dynastic legitimacy symbol. Revered as a benevolent guardian maintaining symbiotic relations with humanity, loong represents cosmic order through its governance of celestial and terrestrial waterways.* 此处理既保留了原语文化意象的独特性，又通过注释为西方读者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同法处理的“玉璋”(jade *zhang*)、“陶盂”(pottery *he*)、“高柄豆”(high-stemmed *dou*)等文物名称，均通过音译保留文化专属性，再以学术性注释补足其历史与礼制内涵，满足专业读者对知识深度的需求。

文物上的纹饰或部件，往往不是作者学术观点阐述的重点，不宜占用过多读者注意力和文本篇幅，故翻译策略多以“音译 + 文内普及性注释”为主，面向普通读者或对文化背景了解有限的受众，注释内

容力求简洁明了，重在快速建立认知框架。例如，“夔”译为 *kui* (a one-legged creature in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y)，直接点明其神话属性。又如“蜀三角形援无胡直内戈”中的“直内”，为戈的一部分，据《辞源》解释，“内”指“戈戟刃下接柄之处”[13]，故译为 *straight nei* (the part inserted into the shaft)，同样采用“音译 + 文内普及性注释”的复合策略，使非专业读者能够快速理解该部件的结构功能。

对于文化民族性、专属性特征相对较弱但仍需准确传达的实物词，如“齿贝”，则主要采取意译策略，但内涵考证仍需严谨。通过文本内证(原文图文对照)、外证(词典与文献核查)及人文互证(参考作者其他著述)，最终确定书中的“齿贝”实指“环纹货贝”，而非 *tooth shell* (角贝，一种长管状略似象牙的贝类)，故译为 *ring cowrie shells* (*Monetaria annulus*)，以通用名与学名相结合的方式，兼顾可读性与科学性。此类处理虽未采用注释形式，但其考据过程同样要求对学术严谨性的坚持。

可见，实物文化词的翻译需根据词汇的文化特性、中西文化差异与目标读者需求，灵活运用音译、定性词与补偿性注释(如“学术性注释”与“普及性注释”)等多种手段。补偿性注释的内容需根据文本需要说明相关实物的形制特征、文化背景与内涵等，确保译本严谨且有据可依。“学术性注释”往往以脚注或尾注形式呈现，论述详细，服务于专业读者对知识深度的追求，注重考据性与规范性；“普及性注释”则通常位于正文内部，短小精炼，以满足普通读者快速理解的需要，强调简洁性与可读性。此外，在查证过程中，综合运用文本内外互证与跨文本参照，有助于在保留文化身份的同时确保译文的忠实性与准确性，从而实现考古文本中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

3.2. 观念文化词(心智活动层)

刘宓庆将“心智活动”层界定为文化心理结构与文化观念结构的集合，涵盖“心理和广泛的观念系统及认知智能活动(高级的智能活动涉及精神财富的创造，如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等)”[11]。《发现三星堆》中属于该层级的文化专有项主要集中于两类文化观念：一是宗教观念类词汇(如“群巫之长”“帝”“祭山埋玉”)，二是民族观念类词汇(如“氐羌部族”)。本文统称为“观念文化词”。

此类词汇的翻译关键首先在于语内理解的准确性，即译者需深入把握词汇所承载的文化观念意义，方能做出恰当的译语选择。

以“群巫之长”为例。其翻译难点集中于“巫”的文化身份定位。通过文本外证可知，“目前学界关于三星堆文化宗教信仰的诸种说法都共同反映其萨满巫覡的宗教信仰传统”[14]。结合文本内证进一步确认，该书语境中的“巫师”或“群巫”并非西方文化中施用“魔法”的“witch”，而更接近于萨满教传统中沟通人神、为族群祈福禳灾的“shaman”。基于此，“群巫之长”最终译为 *chief of the ancient Shu shamans*，既标明其宗教职能属性，又以“ancient Shu”限定其地域文化归属，兼顾准确性与文化身份辨识度。

“帝”一词在古汉语中语义层级复杂，常被译为 *king* 或 *emperor*，但在特定语境中需深入辨析。原文述及：“‘众帝’便是古蜀王国的君长兼大巫师……帝原本是一个祭名，后来演变成天人之际的主神”[15]。此处“帝”兼具祭祀称谓与神格身份，其文化语义远超出单纯的世俗君主概念，不宜简单归化处理。译文采取异化策略，音译为“*Di*”，并辅以文内补充“(emperor)”，以保留其文化独特性，同时为读者提供基本的认知参照。

“祭山埋玉”中的“祭山”同样需要依托文化考据以避免误读。外证研究表明，“祭山”的祭祀对象为“有山神的山和称为神的山”[16]，并非泛指一般的山岳景观。据此，整个短语译为 *burying jade articles as an offering to the Mountain God*，以大写“Mountain God”明确祭祀对象的神格属性，准确传递其宗教行为意涵。

民族观念类词汇亦需作为重要文化专有项加以审慎处理。例如，“氐羌部族”实为两个同源分化又

长期并存的古代部族，故译为“Di-Qiang tribe”，以连字符表明其并立关系，而非合并为“Diqiang”。

综上，观念文化词的翻译关键在于深入溯源源语与目标语双方的文化心理与观念系统，通过内证与外证的互参互证，准确把握词汇的语义本质；在此基础上，依据语境灵活运用异化、归化与补偿策略，方能在跨语言转换中实现文化观念的有效传递。整体而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需要在民族性保存、观念传达、学术准确性与读者接受性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使译本既忠实于原语文化内涵，又具备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4. 结语

4.1. 理论框架与实践发现：考古文本文化专有项翻译的策略体系

本研究以刘宓庆文化翻译理论为分析框架，立足《发现三星堆》英译实践，深入探讨了考古文本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通过对实物文化词与观念文化词的分类考察，本文揭示出考古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行为，更是一项深层次的文化阐释活动。在实践层面，本研究验证并拓展了刘宓庆文化信息层级分类在考古文本翻译中的适用性，将抽象的理论框架转化为可操作的文化专有项识别依据与处理策略，从而实现文化翻译理论从“方法论倡导”向“实践路径指引”的有效落地。

考古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化信息的准确识别与适度补偿是一大核心要务。本文论证了“文本内证”与“文本外证”互参互证在语义考辨中的关键作用，这一考辨路径与刘宓庆提出的“文化历史观照”“人文互证”等语义诠释方法形成呼应，在实践中验证了上述理论工具的有效性。同时，信息的选择性呈现与语境化重构作为保障译文连贯性、增强读者接受度的重要手段，也进一步丰富了文化翻译理论的操作方法论。

针对不同类型的文化专有项，本文依据其所属文化层级提出分类处理策略：实物文化词宜采用“音译 + 定性词 + 注释”的复合补偿模式，以保留文化身份的同时确保信息可及性；观念文化词则需深入把握其背后的文化心理与观念系统，在异化与归化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兼顾文化遗产与传播效果。上述策略既是对刘宓庆文化信息分类框架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化运用，也为文化翻译理论提供了来自考古文本领域的实证支撑，拓展了其在专门用途文本翻译中的解释力与应用边界。

4.2. 翻译生态中的多重协商：外部因素对翻译决策的影响

上述翻译策略的形成与实施，并非完全取决于译者个体的学术判断，而是嵌入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翻译生态之中。《发现三星堆》作为国家外译项目，其翻译决策受到多重外部因素的制约与塑造。首先，项目启动前的定位预设了译文的总体走向。该项目隶属于国家级对外译介项目，明确要求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国际传播力，这一双重定位成为所有翻译决策的基本坐标。其次，项目团队由多位国内外翻译学、语言学、考古学专家教授及研究生合力组成，跨学科的协作机制在微观层面深刻影响着译文形态。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形成了“多轮审校、逐句推敲”的工作模式，审校时尤其注重学术严谨性、术语统一性、语篇可读性与文化敏感度，对初译稿中过于口语化或过度归化的表达提出了调整意见，最终译文在保持可读性的同时更趋学术化与规范化。再次，项目组在术语处理、注释体例、格式规范等方面制定了统一要求，例如规定音译词的拼写规则、注释格式与标注方式，确保了全书翻译风格的内在一致性。

可见，翻译决策的形成是译者学术判断与外部因素多重协商的产物。国家外译项目的战略定位、翻译团队与审校的协作互动、项目组的统一规范、以及多元读者的接受预期，共同构成了翻译实践的现实语境，深刻影响着从策略选择到文本呈现的每一个环节。将翻译生态中这些“可见”与“不可见”的因素纳入分析视野，有助于更全面、更真实地还原翻译过程的复杂性，也为文化翻译理论从“文本中心”走向“过程导向”提供了实践参照。

研究表明, 考古文本的翻译应以文化考证为前提、以语境適切为准则、以读者认知为参照。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不仅应准确传递考古发现的事实信息, 更应深度还原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历史语境, 方能实现从“译出去”到“融进去”的实质性跨越。这一认识也回应了刘宓庆文化翻译理论中关于“文化适应”的核心关切, 即在跨语际转换中寻求文化身份的忠实保存与文化传播的有效抵达之间的辩证统一。

作为一项立足翻译实践的理论反思, 本研究以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考古文本为对象, 围绕文化专有项的处理策略提供了较为典型的英译案例, 在期望为同类文本的翻译实践提供方法论参照的同时, 也以实证方式反哺了文化翻译理论的建设。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考古文本的系统译介机制、考古术语的规范统一、考古翻译的国际合作模式等方向, 助力构建中国考古学术对外交流的双向对话机制, 以更好地承担文明互鉴中的翻译使命。

致 谢

本论文源于笔者参与的、由曹漪那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发现三星堆》。在此, 谨向项目主持人曹漪那教授、主译 Valerie Pellatt 教授以及项目团队全体成员在翻译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指导与宝贵帮助表示诚挚感谢, 同时向《发现三星堆》一书的作者段渝教授致以由衷谢意。

参考文献

- [1] Park, H. (2021) A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Museum Translation Research Overseas and Its Applicability in Korea.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23**, 57-86. <https://doi.org/10.20305/it202101057086>
- [2] Atkinson, R. (2021) Traduzindo Valongo: A Tradução da Proposta de Inscrição do Sítio Arqueológico Cais do Valongo na lista do Patrimônio Mundial da UNESCO. *Cadernos de Tradução*, **41**, 66-85. <https://doi.org/10.5007/2175-7968.2021.e67457>
- [3] Lee, S.J. (2010)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nslation: Rethinking Website Information of Palaces. *Journal of Universal Language*, **11**, 73-90. <https://doi.org/10.22425/jul.2010.11.1.73>
- [4] Chang, V.C. (2025) Archaeology as Cultural Translation: Unearth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rtifacts of the Long-Lost. *Perspectives*, **34**, 1-20. <https://doi.org/10.1080/0907676x.2025.2593974>
- [5] 刘清. 公众考古视野下的海昏侯国考古外译问题初探[J]. 南方文物, 2020(6): 231-236.
- [6] 吕兆芳. 传播视野下三星堆博物馆陈展文本英译研究[J]. 中国博物馆, 2022(5): 42-50.
- [7] 师新民. 考古文物名词英译探讨[J]. 中国科技翻译, 2007(3): 35, 61-62.
- [8] 吴敏焕. 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下考古发掘报告的翻译[J]. 考古与文物, 2011(4): 111-112.
- [9] 陆秀英, 刘敏. 农业考古术语汉英翻译方法探究[J]. 中国科技翻译, 2019, 32(3): 1-3, 49.
- [10] Aixelá, J.F. (1999)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In: Alvarez, R. and Vidal, M.C.-A.,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52-78. <https://doi.org/10.2307/ji.33169489.7>
- [11] 刘宓庆. 文化翻译论纲[M]. 第2版.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9: 29-35, 124-138.
- [12] 张法, 从身饰与礼器看玉器的核心意义及其演进[J]. 甘肃社会科学, 2025(3): 128-139.
- [13] 何九盈, 王宁, 董琨, 主编. 辞源[M]. 第3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211.
- [14] 龚伟. “天下之中”与“神树浴日”: 三星堆文化的宗教信仰与宇宙生成观[J]. 形象史学, 2024(4): 69-88.
- [15] 段渝. 发现三星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41.
- [16] 张肖马. 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山崇拜[J]. 考古与文物, 2010(5): 44-50, 110, 123.